

音乐教育学理论研究译丛

余丹红 / 主编

[德] 维尔弗里德·格鲁恩 / 著

蒋虹 / 译 董勤文 / 审校

德国音乐教育史



E
D
U
C
A
T
I
O
N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音乐教育学理论研究译丛

余丹红 / 主编

[德] 维尔弗里德·格鲁恩 / 著

蒋虹 / 译 董勤文 / 审校

德国音乐教育史

Geschichte
der
Musikerziehung

本研究项目由上海市重点人文学科基地“立德树人”音乐教育教学研究基地
国家“双一流”高校建设项目“音乐教育学理论团队”共同资助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音乐教育史 / (德) 维尔弗里德·格鲁恩
(Wilfried Gruhn) 著; 余丹红主编; 蒋虹译.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9. 11
(音乐教育学理论研究译丛)
ISBN 978-7-5444-8977-5

I. ①德… II. ①维… ②余… ③蒋… III. ①音乐教育
—教育史—研究—德国 IV. ①J60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51880号



责任编辑 于喜 单一丹
装帧设计 郑艺

Wilfried Gruhn: Geschichte der Musikerziehung. Eine Kultur- und
Sozialgeschichte vom Gesangunterricht der Aufklärungs-pädagogik
zu ästhetisch-kultureller Bildung © 1993, 2003 Wilfried Gruhn and
Wolke Verlag, Hofheim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9-400

德国音乐教育史

[德] 维尔弗里德·格鲁恩 编著
余丹红 主编
蒋虹 译
董勤文 审校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123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26
字 数 520千字
版 次 2019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8977-5/J·0596
定 价 129.80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调换 电话 021-64377165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总序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音乐教育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改变:以德国奥尔夫教学法的逐渐进入为契机,我国音乐教育领域开始了放眼看世界的历程。

最初,教学法以其直指人心的力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面向世界的窗户。慢慢地,我们对音乐教育学的概念逐渐扩展到对整个学科领域的探究,音乐教育学领域宽广博大的研究范畴开始呈现:音乐教育史、音乐教育心理、脑科学与音乐教育、音乐教育管理、音乐教育比较研究、音乐课程论、音乐教育评估、音乐教育社会学与人类学、音乐教育哲学、音乐治疗等等——学科意识由此觉醒,音乐教育学领域开始进入空前发展阶段。

至此,学界已对学科疆域与内部体系等结构性问题基本达成共识,音乐教育学学科界定逐渐清晰。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的前身是1927年的国立音乐院师范科。在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音乐教育专业在时断时续的办学历程中坎坷前行。然而,该专业的教育者们始终不忘初心,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基础教育专才,并从中产生了我国第一位基础教育领域的音乐教研员,以及大量进入一线教学单位和音乐教育理论研究与音乐推广领域的音乐教育者,对我国的音乐教育领域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上海音乐学院历任领导都对音乐教育专业的重建、管理与建设给予了最大可能的支持。贺绿汀院长一直心系国民音乐教育,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创立了上海市中小学音乐教育研究会;江明惇院长在贺老的大力支持下于1997年重建了音乐教育专业,并亲自兼任音乐教育系第一任系主任。他们对国民音乐教育的深切期望、对专业音乐学院所需承担的面对社会大众的音乐教育的责任等,都有着独到而深刻的理解,因而给予了该学科足够的自由空间,使其能够遵循其特定轨迹健康成长。即便是在上海音乐学院经济困难的岁月,他们也没有任何学科藩篱与偏见,给予了诸多雪中送炭式的帮助,使得该学科得以迅速成长与发展。

进入21世纪之后,音乐教育系充分继承了自国立音乐院时期师范科的优质教育、精品教育的传统,发挥了上海音乐学院国际化平台的影响力,在学科建设上精益求精,砥砺前行,追求一流。

自2004年开始,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团队在国内、国际音乐教育专业基础与音乐技能等各类比赛中展示了扎实的专业功底:2004、2014两次参加教育部主办的“珠江杯”音乐教育专业基本功比赛,均获得五项全能团体冠军、个人冠军;2012年获得美国辛辛那提世界合唱比赛女生组金牌冠军,之前共获得同类比赛金牌六枚。

我们十分重视学科建设的立意与视野,在国内首次正式提出了以音乐教育学

理论与实践为专业主干课程的本科教学课程体系,并以此为基础理论框架,进行了课程建设与教材建设,构建了一套扎实的音乐教育学理论课程体系。该学科构建理论在《人民音乐》《中国音乐教育》等刊物上发表之后,引起业内的高度关注与认同。

在上海音乐学院自由开明的学术环境下,音乐教育系开始进入蓬勃发展阶段,开始了第一轮理论丛书体系建设。在2010年左右,第一批三十本左右的专著、译著与教材相继出版。该轮建设获得上海市教委“教育高地”项目支持,2014年,成果之一的钢琴系列教材获得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之后,音乐教育专业开始进入学科建设的快车道:余丹红主编的《中国音乐教育年鉴》是我国唯一的音乐教育行业年鉴,被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和香港大学等大学的图书馆收藏;余丹红策划出品的“中国音乐教育(MEIC)系列纪录片”在腾讯等视频播放软件播出后,得到了国际同行的热情回应,为世界了解中国音乐教育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2013年开始,余丹红教授领衔的上海市“立德树人”重点人文基地“音乐教育教学研究基地”成立;2015年,上海音乐学院“高峰高原”项目“音乐教育学团队”获批成立。上海市教委在政策上、资金上给予较大力度的支持和资助投入,将音乐教育学科的研究得以顺利往纵深推进。

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音乐教育学研究团队开始加大音乐教育学理论著作撰写与翻译工作的步伐,大批购买国际一流学术出版社,如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Springer出版社、R&L Education出版社、GIA出版社、SAGE出版社的音乐教育著作版权,批量翻译出版音乐教育学科代表性专著,在音乐教育学领域有效填补了我国与国际前沿研究之间的沟壑——这是争取国际间平等学科对话的必要前提与保障。同时,我们也针对一线教学与社会教育需求,有指向性地为具体受众群量身定制一批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型教材。

感谢我研究团队的同仁与朋友们,正是由于大家为共同追求的目标而忘我奋斗、不懈追求,才使得我们的研究成果落地,一切成为可能。他们是:

中国音乐学院刘沛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

浙江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教师:章艺悦、谢铭磊;

华东理工大学王懿教授、曹化勤教授;

上海优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计乐先生和他的团队;

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高超、罗中一;

留学海外的学生们:吴悠、顾家慰、郭容、胡庭银;

以及我亲爱的同事杨燕宜、彭瑜、胡青、蒋虹等诸位教授,和相伴十几年的学生兼同事陈蓉和颜悦。

感谢给予我研究项目支持的坚强后盾：上海市教委基础教育处、上海市教委科研处、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上海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和上海音乐出版社。

本套新丛书的产生，是在上海市教委科研项目的大力支持下得以付诸实施的。我深知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未来音乐教育学大厦的进阶之石。当下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既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与光荣使命，也是我国音乐教育学学科建设与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

音乐教育事业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关注与支持、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对人格培养有着重大作用的事业。它所承载的不仅是音乐学科知识的传授，还承载着“人的教育”的神圣命题。成功的音乐教育可给予多元情感体验，从而使人拥有更为丰富而润泽的人生。虽然，它不能一鸣惊人，也不能创造直接的物质财富，然而正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功用，才真正体现出“百年树人”的意蕴。

这，也就是音乐教育研究最终指向的理想与目标。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

余丹红

2017年7月7日

序 言

“音乐唤醒了这个时代，它唤醒了这个时代最高贵的享受，它唤醒了……就这点而言它是高尚的。”在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小说《魔术山》中，挑剔的人道主义者、哲学挑战者塞腾布里尼(Settembrini)在和堂兄弟汉斯·伽斯特豪普(Hans Castrop)及约阿希姆·齐本(Joachim Ziemben)交谈时这样评价音乐。他还说道：“如果艺术使人觉醒，那么它就是高尚的。反之，倘若它使人麻木、催人入眠，并且成为进步和活动的阻碍，那又该如何呢？由于这个原因，它的作用如同鸦片，有魔鬼般的影响力，我的先生们！鸦片来自魔鬼，它使人消沉、懒惰、被奴役……这是音乐使人忧虑的地方，我的先生们。我认为，音乐具有多面性”。¹

汉斯·克里斯蒂安·施密特(Hans Christian Schmidt)在《音乐教育手册》²第一册前言中很醒目地将这段话写在前言。因为道德性和危险性是音乐的两个极端，对音乐和音乐教育所做的每一个思考都介于这两者之间。当人们需要消除一些不良影响(例如技术、科学化、世俗化等)时，就会需要音乐的道德影响力和人文意义；另一方面，音乐拥有感动人心的强大力量，人们必须对此警惕，以防陌生(政治、宗教、经济)势力利用(例如用于广告和政治煽动等等)它来对我们造成情绪上的影响。当指出音乐的道德意义和音乐教育中音律(柏拉图)的伦理意义时，音乐在教育大纲中只是一个媒介，用以达到改善和使人高贵的教育目的(教育通过音乐发挥作用)，同时也必须警惕和克制音乐反方面的危险性及其运作机制。

整个19世纪都充满着通过音乐来净化人的思想。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净化人的教育越来越多地带有国家的政治目的：教育人们成为顺服的、爱国的子民，以及健康的战士。在这种肤浅的教育思想下，专业领域内部的争论仅围绕着什么是学习歌唱的正确方法展开。这并没有被认为是最好的方法，当时的外国访客对此进行了报道，他们中有英国人约翰·胡拉³(John Hullah, 1879)和约翰·斯宾塞·柯尔文⁴(John Spencer Curwen, 1883、1889和1898)，但美国人洛厄尔·梅

-
- 1 托马斯·曼(Thomas Mann):《魔术山》，第1册，柏林，1926，第193页。
 - 2 汉斯·克里斯蒂安·施密特(H. Chr. Schmidt, 主编):《音乐教育史》，卡塞尔，1986，第151页(《音乐教育手册》，第1册)。
 - 3 作曲家、教育家与音乐撰稿人(1812—1884)，代表英国政府访问了不同的欧洲国家并且在一份议会报告阐述他的经历。参照第6章第3节。
 - 4 音乐出版家和音乐家(1847—1916)，著名音乐教育家约翰·柯尔文(John Curwen)的儿子。J. 斯宾塞·柯尔文(J. Spencer Curwen)在1882—1901年访问了大部分欧洲国家和北美洲，以调查主音 Sol—fa(首调唱名法)的分布状况。他的报告《外国学校音乐教育》于1901年出版(德语译本，1989)。参照第6章第3节。

森¹(Lowell Mason, 1837 和 1852—1853)则为德国公众音乐生活、合唱团的状况以及音乐会活动所拥有的崇高地位而惊叹不已。

直到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在教育革新运动和改革所谋求的大框架中,音乐这一学校科目的专业性和计划性才更多地受到重视。这样一来,音乐教育脱离了带有政治目的的教育思想并逐渐转向专业性的教学法问题,并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学科“音乐教育学”。在这个学科内发展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和理论,它们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反映了社会发展趋势以及对音乐内容和结构的影响。自我的认知和对外解释学科意义的转变显而易见。尽管如此,它们仍然和历史传统牢不可分。

20 世纪的音乐教育史了解——当时它受政治条件限制——这两个极端:音乐的道德力量和危险的诱惑力,通过音乐来达到一定的权谋。但是这种趋势的确定是有所保留的,也就是通过音乐来达到教育影响(“净化”)的思想源于 19 世纪,新人文主义来自古典伦理学,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缪斯教育思想也以此为依据。另一方面,它更是 20 世纪启蒙思想的标志,例如,把音乐的作用机制作为抵制操控的保护力量,把加强自治和自主作为最高教育目标重新进行研究,并从专业教学法的角度重新设定目标。

这个世纪初“缪斯教育”这一理念出发点源于更新人类教育的思想。“不是民族,不是逻辑,也不是民主的,而是缪斯教育是人类教育的核心。虽然它不能保证,但它使文明得到重生。”² 弗里茨·约德(Fritz Jöde, 1887—1970)这样描述过缪斯教育的本质:“单单通过音乐专业措施并不能更贴近它”,更确切地说我们应该“感觉到音乐教育和人类教育是不可分的一个整体……音乐不再关乎情绪,而是关乎价值观。”³

从这点看,这与第三帝国中音乐教育被作为强权政治中的价值观教育差距并不太大。“不是单方面地从专业的层面围绕着音乐,而是从认识德国特色的角度,从文化意识的角度要求,在德意志人民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建设中……必须使用音

1 L. 梅森(L. Mason, 1792—1872)被公认为是美国学校音乐教育之父,他促进学校歌唱课的发展并为德国声乐教育法提供理论指导。他在 1834 年出版的《手册……献给声乐要素教学,根据裴斯泰洛齐体系》,很大程度翻译了库伯勒(Kübler)的《指导说明》。他在他的日记(1837,出版时间:1990)和《来自海外的音乐信件》(1853)中详细报道了他两次欧洲之旅的经历。

2 奥托·哈瑟(Otto Haase):《音乐生活》,1951,摘自 U. 君特(U. Günther):《第三帝国的音乐教育》,摘自 H.Ch. 施密特(H.Ch. Schmidt, 主编):《音乐教育史》,卡塞尔,1986,第 151 页(《音乐教育手册》,第 1 册)。

3 弗里茨·约德(Fritz Jöde):《音乐和教育》,沃尔芬布特,1919,第 14-19 页。

乐。”¹ 缪斯教育的团队建设力量和情感建设力量很容易在政治上作为发展民族共同体的主要手段而被误用。

这貌似合理,因此总是在学校音乐教学中被合法化,音乐的道德性简直注定了它会用于人的教育。但同样明确的是,纯粹以教育为目的使用音乐会带来多么大的危险(是怎样的一类音乐?)。确切地说,如果没有定义过人的形象,音乐又如何被滥用教化出怎样的人呢?(臣服的子民、听话的公民、成熟的听众、批判的民主主义者等等)。而且当音乐仅作为手段服务于另一目的时,音乐自身的专业独立性、音乐和音乐作品的特殊性和独特性都会被忽视,这也很成问题。

从广告音乐到进行曲,从欢快的流行歌曲到迷幻的摇滚乐,到处都可以看到音乐的巨大影响力,这一切简直使音乐教育备受争议,它背离了缪斯体验对内化化的崇拜,更多涉及的是距离、启蒙和批判意识。也就是说,课程改革后在第一本教科书的序言:“通过批判性反思,在音乐多种多样的功能和表现形式中改变了我们和音乐的关系。一目了然的艺术体验和有关个体纯艺术的内化相比品质不同……音乐和音乐课作为‘阐明意识的工具’[阿尔弗瑞德·韦伯(Alfred Weber)]和‘世界的觉醒’[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是使世界美学重生的两个互为制约的方面。”²

巴聪·布豪柯(Bazon Brock)恰巧把情绪与感受幼稚的激情差距描述为教育的特点:“我仍然可以清楚地记得,我上伊策霍埃的卡尔国王文理中学时必须唱《神是我们的山寨》或国歌,那时我总是在想:物理课的作业是什么或‘Latte’这个词的拉丁文是什么,只是为了让我不被音乐控制。而在军事学上我充分体验了这种控制力。”³

音乐的道德性和危险性为各种争论和反思划定了疆界,20世纪的音乐教育一直在这个范围里合法化并受到批判。在19世纪,音乐与教会的牢固联系使它成为普通义务制学校的科目。这种联系早已不存在。当前教育政策围绕着完全不同的问题展开,它们是关于

- 技术创新在日常生活中对音乐制作和音乐理解接受的影响;
- 不断增加的休闲时间所提出的挑战;

1 瓦尔特·库恩(Walter Kühn):《音乐导览》,拉尔,1939,摘自U.君特(U. Günther):《第三帝国的音乐教育》,引文出处同上,第107页。

2 《音乐时事》,一本给中学和大学阶段学习的由W.布雷考夫(W. Breckoff)和G.克莱南(G. Kleinen)等编写的音乐书籍,卡塞尔,1971,第10页及下文。

3 摘自《什么是音乐教育?》,W.柯律佩尔霍尔茨(W. Klüppelholz)与B.布豪柯(B. Brock)等人的谈话,卡塞尔,1984,第15页(音乐的时事问题14)。

- 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保持或发现自己的文化身份；
- 在机会平等的学校中选拔(有较高天分的)人才；
- 在绩效社会中进行合作的、社会性的学习。

这类定位的问题总是只能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因为不同问题来自各自的历史时期,并且只能从它们的历史背景中进行了解。在当今的学校和社会中,人们需要重新质疑音乐教学历史和音乐课的合法性。因此,本书最后一章会提到,20世纪80年代关于音乐教育所进行的讨论,使人们认识如今围绕着合法化和奠定基础所提出的内容。这是学习的新看法,还是只是早已熟悉的模式的一个交流,当我们把音乐理解为与认知课程相对的情感平衡,或者作为一种艺术的审美教育,或是作为课余生活中共同的音乐实践,或者承认音乐教育是人类的义务来发展和促进现有的技能(天才),或者作为一种艺术的阐述方式更好地改善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或者仅仅在大众和商业音乐课程中提供定位标(批评或务实的),或把音乐作为一种表现自身需要的工具?

纵观历史,不同的发展路线和转折点可以清楚地说明,它如何以及为何形成了特定的发展,它们有什么含义,它们对什么做出了反应,在什么情况下它们是可以理解的,也许是必要的。回顾历史的同时也回到当下,它重新引人注目,也许会暴露一些本来会被忽视的东西。音乐所特有的合乎道德和令人质疑的部分,并不是开启这个专业的整体历史的万能钥匙,但说明了一个观点,它总是鉴于在情感道德教育和启蒙教育的要求之间确立音乐教育。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音乐和音乐教育中发生的大量事件既令人疑惑也令人着迷。专业化时代的个人敢于阐述整体,这看上去似乎很狂妄。但我们也只能成功地进行部分阐述。因为学校音乐教育的历史并非完全独立于校外的器乐课。同样,学校音乐教育的历史总是包括普通学校的历史,因为音乐课或歌唱课总是要适应特定的学校和社会状况。这里,兴趣的焦点在于音乐在学校中的地位。我们首先谨慎地回到19世纪,因为在普鲁士实行了洪堡(Humboldt)和苏文(Süvern)的改革,学校结构和课程结构已经形成,至今仍然起着作用并影响着关于学校和教育的想法。与此同时,学校外开始建立了音乐教育机构,它们伴随或实现了市民音乐生活的文化繁荣。另一方面,从古希腊古罗马到启蒙运动的较长时间中,音乐的发展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需求。

在写这本书时,德国实现了统一。什么是更有意义的,就是把东德学校音乐教育史作为一个分支进行研究,其在1945年拥有一个共同的根基上由缪尼西(Münnich)、马尔腾斯(Martens)、豪耶特(Reuter)等带领发展,并产生了自己的新枝和嫩芽。但事实是,这样的重新评价是在所有资料和文献没有得到合法承认的

情况下进行的。这点必须在以后的版本中加以研究论述。

因此我们将描述仅局限在 19 和 20 世纪,并且这里还须有一个进一步的限制:涉及的只是普鲁士学校音乐教育史,其作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产物,以及特别是在 1871 年德意志帝国民族统一中的作用,就像在 1933 年第三帝国中一样。即使个别邦联有自己的文化决策能力,但普鲁士依然占有统治和主导地位。有趣的是,自由的巴登或保守的符腾堡和巴伐利亚,萨克森或奥登堡这些地方的特点完全不一样。但同样的,在这里首先应该涉及的是一般思潮和音乐教育观点,而不是地方的特色发展。

在这样不完备的认识中,我们递呈了音乐教育史,因为这是以许内曼(Schünemann)的尝试为基础所做出的一个庞大的总结概括,还包括对单个手册类书集[库恩(Kühn),1931;雷贝尔克(Rehberg),1954;莫瑟尔(Moser),1962;浩普弗(Hopf),1984;H.Ch.施密特,1986)]的查考研究。对此也激起业内人士对历史问题研究兴趣的再次增长,如数量众多的关于 20 世纪初的特别研究和专著的发表[马丁(Martin),1982;哈默尔(Hammel),1990;费佛尔(Pfeffer),1992]。关于 19 世纪的阐述看起来比较糟糕,克来默(Kramer,1990)、吕普曼(Löbmann,1908)和席普克(Schipke,1913)仍然是最重要的参考推荐,他们详细地阐述声乐教学法的发展。针对上述作家,我们想要改正不足之处,并在一个更大时间范畴内总结概括研究。这里也涉及选择的困难。阐述对于细节的完整性不仅仅是看不到全貌,还有不可读性的特点。历史的概要不能替换对特殊问题的调查研究。

相反,这个阐述尝试在结构和历史事件中起到平衡的作用。“结构历史”这一专有名词规定:影响历史的个别事件和行为,需屈服于更高层次的参考系统,必须明确考察,能理解和评估个别事件的意义。这里应该以这些结构的预备编制,而不是以所有个别事件的完整列举而定。瓦尔特·维欧哈(Walter Wiora)为音乐历史阐述导入了总谱图片作为见解模型:在一个历史的进程中,总有主要和次要的相符规范部分,它们在同一时间或规范中交错进行。这是诠释观察者的事情,需确定什么作为主要的脉络,什么作为次要的脉络(一幅图),这样的结构适用于学校音乐教育史,这就是为什么理想的阅读形式总是一份总谱。因此,严格的年历表总是被遗弃,当它以上下文背景为关键点时;人们不得不大量横向和反复参看阅读材料,加倍查阅总是必不可少的。

历史的活动不需要任何特殊的理由,但定位至关重要。如果人们思考音乐课的历史,总是会处于这样一个危险境地,仅仅看到一连串的事件,就像它是根据资料的出处来阐述:官方法令和法规、在档案和期刊中的官方报告。但这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学校日常生活究竟发生了什么,个别教育者所做的和思考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这么想,这些都很难再重塑的。这是作为一个“底端的历史”,是对送交的

学校经历、教学报告和历史参与者的书稿的总和。铭记这种困境,我们应该尝试这两种方式:实践,它是怎样的;与什么样的发人深省的条件相关。

因此,正确的历史命题是:“是什么,这是我们首先要完全理解的,当我们认识了,并清楚它是怎样形成的”[德罗伊森(Droysen)],要尽量少做历史假设的阐述,只有当我们阐述历史自身因素时,我们才能理解历史。相反,探查历史的眼光总是会回到当下。“过去是什么,我们对此感兴趣不是因为它已经过去,而是因为它在一定意义上还对今天有影响”(德罗伊森)。我们专业的历史和它的意识发展应该最终服务于自我立场的确定和找到自我位置,使音乐教育活动不是延续没有反馈的、经验式的和传统传授的原则,而是使人们能够知道和做出决定,人们做了些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但这一深入的研究,并不是主要基于在历史中吸取教训。这样只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一本书的深入研究。它不会也不愿规范地分析阐述,发生了什么,如果……它也没有提供一个客观的历史图片来说明过去两个世纪音乐课或歌唱课发生了什么。但人们仍然有必要依靠主观色彩的尝试来认识和理解它们在多方面的环境和纠缠中的时间结构、政治事件和专业发展。它想要显示一般结构的相关性,同时也紧抓那些重要的、有特点的或至少是有趣的个别部分。这预计成为一本教学和阅读书籍,但是其中的描述也只是一种解释而已。

最后,我衷心感谢在这本书的创作中所有给予建议和批评意见的友人,特别是海德·哈默尔博士(Frau Dr. Heide Hammel)和乌尔黑西·君特先生教授博士(Herrn Prof. Dr. Ulrich Günther),他们阅读了个别章节,并提供了批评性的评论,海尔姆特·格豪斯曼先生(Herr Helmut Großmann)和托马斯·尤里希先生(Thomas Julich)对于理查德·缪尼西(Richard Münnich)、图书馆和档案馆提供了大量提示,为这项工作的咨询和文献来源提供了支持,特别是在弗莱堡的德国民歌档案馆,总是提供了忠告和咨询,最后还有苏珊娜·法尔克(Susanne Falk)和尤纳斯·海尔曼(Jonas Herrmann),阅读校对了手稿,以及侯曼·巴布勒(Roman Babler)的最终编辑和目录的制作工作。

弗莱堡,1993年3月

第二版序言

《音乐教育史》的新版本目的在于,引起对音乐课历史根源究竟有哪些感兴趣的点可以思考。一个承担着很多教育、专业和社会挑战的音乐教师,是否必须知道他本专业的历史?他在职业生涯中会运用这些知识吗?也许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历史知识,而是一种历史意识,作为一种态度对自己的教学活动有所反思。1873年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就“历史对生活的益处和缺点”进行了提问,并发现动物和人特别以此来区别,也就是对过去有无意识来区别的。

“因此动物是没有历史:因为这涉及现在……另一方面,人们对过去沉重和越来越沉重的负担表示反对:这把他压倒或把他压向旁边,这作为一个无形的和黑暗的负担加重了他的步伐。”(斯图加特,1982,第8页)。

历史可以因此成为一种负担,正如我们从自己的历史痛苦经历中所知道的那样,这阻碍了我们不加思考自由的行为。只有创造新的、打破传统习俗的实干家,才需要忘记过去;只有实干家是不顾一切的(歌德),因为他在行动中完全忘记自己活在当前是为了对未来产生影响。但作为政治和社会人士,我们也需要反思,停止行动,回顾过去,不是从过去中学一些东西(人们只能从自己的经历和实践操作中学习到东西),而是提高一种在上下关联中思考的意识,我们总是处于其中。

也许这解释了我们对自己专业历史感兴趣的新的原因,从而使得新版本的出版成为必要。据此,各个章节都进行了修订和扩展。这里特别感谢来自德国民歌档案馆的芭芭拉·保柯(Barbara Boock)女士,为我们孜孜不倦地提供了文献来源和咨询情况。新版本还添加了对20世纪末最新发展状态的概览。首先,本书对(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音乐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挑战,由于两德统一没过多久,所以这段历史阐述不予以考虑。如今德国整体的形势使之成为必要,应当介绍阐述44年之久独立历史的不同发展脉络。要获得一幅客观、不偏见确切情况的图像和(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音乐教育中的音乐教学方案,还要清楚得区分政治上适宜的官方通告和个人的信念,这可能还为时过早。目前尚未对所有现存的文献和档案进行全面的评估,因此今后的历史研究必须要保留这点内容。尽管如此,在新增的第16章中,我们还是尝试从当今的角度来进行完整阐述。这里我要感谢贝恩德·弗律德(Bernd Fröde)对一些事物的建议,以及特别鸣谢君特·奥利亚斯(Günther Olias),他作为(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音乐教育家和其所经历的(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历史在当今评论中的差异,根据个人的经验给出了很多建议和纠正意见。

最后,更新和扩展了参考文献目录,使今天的读者也可以找到更多关于学校音乐教育和音乐课历史新的阐述。其余章节基本保持不变。同时我们还保留了标题,

为了和第一版保持关联,尽管这可能是比较正确的方式,从学校音乐教育或音乐课的历史角度来说,避免意识形态和历史上不是没有负担的(音乐)教育概念问题。

回顾历史,我们认识到在狄尔泰人文学科的理解概念中和在利兹(Lietz)、维尼肯(Wyneken)、吉赫布(Geheeb)等教育家的带领下,已经在100年前第一个教育改革运动爆发的时候,就建议和尝试在一所不同的学校(乡村教育之家、劳作学校等)中进行一种另类的学习方式(学习学校和辅导学校的方式)。课程改革形成了20世纪的第二次大型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带来了很多结构上的变化,但其中内容上的变化却无法长期贯彻。今天在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之后,基于所有的原因,我们重新抓住和继续思考已经存在的改革苗头的部分成功和部分失败问题。然而却呈现出相反的情况:高年级的改革措施被撤回,班级人数和课时工作量被提高(抵消了每个有创意的措施),一般教育标准被实施(尽管在美国和英国已经出现负面的经验),也就是规定了更多的控制条例和中央规则(中央高中毕业考试!),代替对教育危机原因的研究、条件的分析和内容上新的调整(新型学校中新的学习方式)的推进。这里的历史意识很可能完全成为方向上的指导。

从历史中学到什么?这不是重点;更重要的是,更确切地了解目前的情况和看清未来的事态发展,我们要更敏锐地察觉过去事件对现在的意义。对此可能出现一个新的意识,使我们作为教育者实干家不那么无知。

弗莱堡,2003年夏天

目 录

总 序	余丹红
序 言	I
第二版序言	VII
第 1 章 启蒙运动的诉求和学校的现实——18 世纪和 19 世纪音乐教育概览	3
第 2 章 1809—1830 年世俗音乐教育	13
1. 普鲁士学校教育改革	13
2. 音乐在教育中的地位	17
3. 教师教育改革	22
第 3 章 歌唱课的新途径——声乐教学法	27
1. 裴斯泰洛齐原则下的声乐教学法	29
2. 裴斯泰洛齐观点继承者的声乐教学	41
弗里德里希·威廉·林德纳的教学大纲	43
狄奥多西·阿布斯的教学方法	44
卡尔·奥古斯特·泽勒的歌唱教学法	45
罗特威尔的声乐教学法	46
约翰·高特弗里德·亨茨奇的方法指南	47
3. 对方法的争论	49
纳讨普致力于学校和教会歌唱教学的改进	50
库伯勒的《说明》	55
霍曼的实践课程	57
4. 文理中学的歌唱课	59
罗维的声乐教学法	59
亨茨奇改革介绍	60
第 4 章 校外音乐教育	63
1. 音乐教育机构的创建	63
2. 业余爱好者的教育	70

第 5 章 三月革命前和反动时期(1830—1866)音乐教育的改革和复辟	77
1. 从洪堡改革到施蒂尔监管(1854)的普鲁士教育政策	77
阿道夫·第斯多惠	78
2. 学校歌唱课	82
恩斯特·朱利叶斯·亨切尔	83
3. 师范学校的培训: 以波茨坦为例	93
第 6 章 1866—1890 年民族学派中的教育	98
1. 1866 年后学校的发展	98
文化斗争中的国民学校	99
为文理中学的垄断而进行的斗争	100
女子学校体系的扩建和教师职业的女性化	104
2. 市民音乐生活	105
3. 歌唱课服务于政治利益: 帝国音乐教育	107
第 7 章 法国和英国的歌唱学校运动	116
第 8 章 1890—1918 年青年运动与教育改革	
——第一次教育运动: 从候鸟运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23
1. 世纪末与新时期的曙光	123
2. 青年人的觉醒: 候鸟协会和自由德国青年	125
3. 青年的觉醒: 青年工人运动	134
4. 教育改革的精神冲击	140
艺术教育运动	141
乡村教育之家的音乐	144
劳作学校	154
5. 学校歌唱课的发展	155
6. 克雷兹施马尔和音乐教育协会的教育改革目标	161
第 9 章 1918—1933 年危机与剧变——青年音乐的转折	171
1. 青年音乐运动和歌唱运动	171
2. 约德的音乐教育工作	180
3. 缪斯教育	183
体态律动教育: 雅克-达尔克罗兹	186
原本性音乐练习: 卡尔·奥尔夫	186
法兰克福与奥得河音乐之家: 格奥尔格·高奇	188
4. 凯斯滕贝尔格的改革: 国民教育与专业化	189
5. 学校音乐教育改革后的音乐课现状	200

第 10 章 1933—1945 年第三帝国的音乐教育	207
1. 文化政策与教师教育	209
题外话:“退化的音乐”	215
2.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缪斯教育	218
3. 希特勒青年团的音乐工作	222
4. 战争爆发后的音乐和音乐教育	225
5. 学校音乐教育改革的有效作用或无效作用	226
第 11 章 二战之后音乐教育再定位的趋势	229
1. 1945 年之后的情况	229
2. 对青年运动和音乐人的批判	236
3. 新定向	242
新的学校测量标准	242
艺术作品定向	244
第 12 章 20 世纪 70 年代课程改革的科学转变——第二次教育改革运动	249
1. 经验科学对课程修订的影响	249
2. 以科学为中心的学校音乐教育	256
3. 教育和培训改革	258
题外话: 大学教育改革中的音乐教师教育	260
4. 音乐教育学作为学术科学	262
第 13 章 课程的开始——新的音乐教学学方案	265
1. 音乐教育中的新风向	265
2. 受青睐的教学原则	268
学生定向	268
行为定向	269
创造力教育	271
3. 专业教学学方案	273
艺术的幻灭: 社会学苗头	273
听力训练: 听觉感知教育	275
在感性中的生活: 审美教育	276
所有感官的感知: 多元审美教育	278
理解和解释: 音乐的教学学诠释	281
经验启发式音乐教育	284
流行的现实意义: 摇滚乐和流行音乐教学学	285